

傅斯年文集

性命古训辨证

傅斯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傅斯年文集

性命古训辨证

傅斯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命古训辨证 / 傅斯年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0

（傅斯年文集）

ISBN 978-7-5325-6418-7

I. ①性… II. ①傅… III. ①汉字：古文字-训诂②思想史-中国-先秦时代 IV. ①H121②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5381号

傅斯年文集
性命古训辨证
傅斯年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3 字数 186,000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

ISBN 978-7-5325-6418-7

B·776 定价：25.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说明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1916年入北京大学国文门。1918年参与创办《新潮》月刊。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年底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后转入伦敦大学。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1926年回国,次年任中山大学教授、代理文学院院长。1928年参与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任所长23年。1936年后,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主要建构者之一,他组织、领导以史语所为核心的学术群体,开拓并推进了诸如考古学、甲骨文、金文研究和清宫档案的收集与研究等很多领域;他所主张的治学宗旨和目标,以及强调中国历史学的专业化和收集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等等,都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建立与发

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傅斯年一生著述颇丰,1952年在其逝世两周年时台湾大学出版了由傅孟真先生遗著编辑委员会编的六卷本《傅孟真先生集》,1980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七卷本《傅斯年全集》,2003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欧阳哲生主编的七卷本《傅斯年全集》。

本社《傅斯年文集》首批推出傅斯年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诗经〉讲义稿》、《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战国子家叙论》、《史学方法导论》、《〈史记〉研究》、《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等八种六册,傅斯年的其他著述也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性命古训辨证》1940年正式出版。此书作于抗战之初,中经战乱,上下卷在上海排印,中卷在香港排印,故版式不一。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曾对该书进行校订和整理,并收入《全集》第二册。湖南教育版《全集》收入第二卷。今以联经版所收者为底本进行校订。

读者注意：

一、本书上下二卷在上海排印，中卷在香港排印，故版式颇不一致（如中卷每章起页，其他则否，其一例也）。欲加以齐一，又恐增添错误，故仍其式以付印。

二、标点符号未及细检，排者于“读号”或作旧式之点，或作新式之钩，著者亦不解此分别何在，如加以改正，又恐增加错误，故一仍之。

三、引书之处每不及对原书，校时又无清稿在手，一切疏漏，读者谅之。

著者校毕记

序

此书自写成至今，已一年有半，写时感念，今多不能记忆。且清稿已先付商务印书馆，手中别无副本可资检查。四邻喧嚣，行处不定，不能运思以为序，则姑述本书写就之始末及求读者所见谅留意各事，以代自序之常例焉。

一、“生”与“性”、“令”与“命”之关系，及此关系在古代思想史上之地位，余始悟之于民国二十二三年间，始与同事丁梧梓先生(声树)言之，弗善也。二十五年初，移家南京，与徐中舒先生谈此，徐先生以为不误，劝余写为一文。遂于是年夏试写，初意不过数千字之篇，下笔乃不能自休。吾之职业，非官非学，无半月以上可以连续为我自由之时间，故原期国庆日前写就者，至是年之尾大体乃具。其下篇尤为潦草，其中有若干章，次年一月无定居时所写也。写成后，恳同事陈骥尘先生(钝)分忙为我抄成清本，骥尘则偶置其职务，或断或续以抄之。自二十五年夏初写此书时，至次年八月上海战事起，一年之中，余三至北平，两候蔡子民师之病于上海，游秦蜀，顺江而下，至南京不两旬，又登庐山，七月末乃返京。不仅作者时作时辍，即抄者亦然。缘吾不能安坐校对，故抄者亦不能不若断若续也。陈钝先

生所抄者为中下两卷，上卷仅抄数页，战事即起，同人心志皆不在此等无谓之事矣。二十七年二月，以中、下两卷，交商务印书馆，上卷拟自抄，终无暇也。适张苑峰先生（政烺）送古籍入川，慨然愿为我抄之，携稿西行，在停宜昌屡睹空袭中为我抄成，至可感矣。故上卷得于前月寄商务印书馆，一段心事遂了，此皆苑峰、骥尘之惠我无疆也。今详述此经历者，固以谢二君，亦以明本书文词前后绝不一致之故，以祈读者之见谅也。

二、写此书时，每与在南京同事商榷。益友之言，惠我良多，凡采入者，均著其姓氏。谨于此致其感谢。

三、本书上卷第二章所引殷周彝器铭识，除诸宋人书外，皆录自《攷古录》、《邃斋集古录》、《陶斋吉金录》、《善斋吉金录》、《小校经阁金文》、《贞松堂集古遗文及补遗》、《殷文存》等习见之书，尤以《攷古》、《邃斋》、《贞松堂》三书为多（亦间录自今人郭沫若先生之《金文辞大系》等。此书本为通论，不属著录，然余信手引据，但求足证吾说而已）。盖写时《周金文存》为人借去，而某氏之《三代吉金文存》未出版也。当时凡引一条，必著其在此书中之卷叶，以求读者便于检寻。文属急就，所引卷叶不敢保其无误，而群书常见之器则不复注明。越一年有半，苑峰在宜昌为我抄成清稿时，其旅途中携有《三代吉金文存》，而诸书未备，乃将原引自《邃斋》、《攷古》、《贞松堂》等书并见于《三代吉金文存》者，一律易以《三代吉金文存》之卷叶，复增此一书中可采入者三十余条。余至重庆初见之，深

感苑峰贻我之深，然亦颇有改回之志。盖夫己之书，少引为快，一也。新书之价，本以欺人，学者未备，二也。旋以手中无书可查，原稿中注明之卷叶未必无误，苑峰所录则无误，故徘徊久之，卒乃姑置吾之情感以从苑峰焉。

四、两年前始写上卷时，以引书较多，用文言写自较整洁，及写至本卷末章，乃觉若干“分析的思想”实不易以文言表达。写至中卷，尤感其难。终以懒于追改，即用文言写去，有此经验，深悟近代思想之不易以传统文言纪录之也。盖行文之白话正在滋长中，可由作者增其逻辑，变其语法，文言则不易耳。

五、引书之简繁，亦是难决之一事。盖引书愈约（或仅举出处，尤佳），则文辞愈见简练，而读者乃非检原书不能断其无误也。此利于作者而不利于读者。引书愈繁，则文辞愈见芜蔓，而在读者可省獭祭之劳。此利于读者而不利于作者。余思之久，与其使读者劳苦，毋宁使吾书具拙劣之面目耳。

六、本书标点，前后未能齐一，盖抄者非经一手，校对不在一时，即付之印者亦分两次，故不及画一之也。战时能刊此等书，即为万幸，无须苛求。读者谅之。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

傅斯年记于汉口江汉一路之海陆旅馆

目 录

序	1
引语	1
上卷释字	7
第一章 提纲	9
第二章 周代金文中“生”“令”“命”三字之统计及其字义	11
第三章 《周诰》中之“性”“命”字	37
第四章 《诗经》中之“性”“命”字	47
第五章 《左传》、《国语》中之“性”“命”字	57
第六章 《论语》中之“性”“命”字	65
第七章 论《告子》言“性”实言“生”兼论《孟子》一书之 “性”字在原本当作“生”字	68
第八章 论《荀子·性恶》、《正名》诸篇中之“性”字在 原本当作“生”字	74

第九章	论《吕氏春秋》中“性”字在原本当作“生”字	79
第十章	“生”与“性”、“令”与“命”之语言学的关系	82
中卷释义		95
第一章	周初人之“帝”“天”	97
第二章	周初之“天命无常”论	110
第三章	诸子天人论导源	132
第四章	自类别的人性观至普遍的人性观	141
第五章	总叙以下数章	148
第六章	春秋时代之矛盾性与孔子	157
第七章	墨子之非命论	168
第八章	孟子之性善论及其性命一贯之见解	178
第九章	荀子之性恶论及其天道观	190
第十章	本卷结语	203
下卷释绪		207
第一章	汉代性之二元说	209
第二章	理学之地位	222

引 语

《性命古训》一书，仪征阮元之所作也。阮氏别有《论语论仁》、《孟子论仁》诸篇，又有论性、命、仁、智诸文，均载《肇经室集》中，要以《性命古训》一书最关重要。此中包有彼为儒家道德论探其原始之见解，又有最能表见彼治此问题之方法，故是书实为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两书之后劲，足以表显清代所谓汉学家反宋明理学之立场者也。自明末以来所谓汉学家，在始固未与宋儒立异，即其治文词名物之方法，亦远承朱熹、蔡沈、王应麟，虽激成于王学之末流，要皆朝宗于朱子，或明言愿为其后世。其公然掊击程朱，标榜炎汉，以为六经、《论语》、《孟子》经宋儒手而为异端所化者，休宁戴氏之作为也（汉学家掊击宋儒始于毛奇龄，然毛说多攻击，少建设，未为世所重）。然而戴氏之书犹未脱乎一家之言，虽曰疏证孟子之字义，固仅发挥自己之哲学耳。至《性命古训》一书而方法丕变。阮氏聚积《诗》、《书》、《论语》、《孟子》中之论“性”、“命”字，以训诂学的方法定其字义，而后就其字义疏为理论，以张汉学家哲学之立场，以摇程朱之权威。夫阮氏之结论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法则足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仪型。其方法惟何？即以

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是也。

夫阮氏一书之不能无蔽者，其故有三。在阮氏时，汉学精诣所在，古训古音之学耳！其于《诗》、《书》之分析观念或并不及朱子、蔡沈；其于古文字之认识，则以所见材料有限之故，远在今人所到境界之下。阮氏据《召诰》发挥其“节性”之论，据《大雅》张皇其“弥性”之词，殊不知《召诰》所谓“节性”，按之《吕览》本是“节生”，《大雅》所谓“弥尔性”，按之金文乃是“弥厥生”，皆与性论无涉。此所用材料蔽之也，一端也。孟子昌言道统，韩愈以后儒者皆以为孟子直得孔门之正传，在此“建置的宗教”势力之下，有敢谓孟子之说不同孔子者乎？有敢谓荀子性论近于孔子者乎？此时代偶像蔽之也，二端也。自西河毛氏、东原戴氏以来，汉宋门户之见甚深。宋儒之说为汉学家认作逃禅羽化，汉学家固不暇计校宋儒性命论究与汉儒有无关系，亦不暇探讨禅宗之果作何说，道士之果持何论也。自今日观之，清代所谓宋学实是明代之官学，而所谓汉学，大体上直是自紫阳至深宁一脉相衍之宋学，今人固可有此“觚不觚”之叹，在当时环境中则不易在此处平心静气。此门户蔽之也，三端也。有此三端，则今人重作性命古训者固可大异于阮氏，此时代为之也。吾不敢曰驳议，不敢曰校证，而曰辨证者，诚不敢昧其方法之雷同耳。

“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之一法，在法德多见之。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研治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著

书者，其出发点与其结论每属于语学。十年前余教书中山大学时，写有《战国子家叙论》讲义（此书旧未刊，今拟即加整理付印），其序《论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一节云：

世界上古往今来最以哲学著名者有三个民族：一、印度之亚利安人；二、希腊；三、德意志。这三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他的文化忽然极高的时候，他的语言还不失印度日耳曼系语言之早年的烦琐形质。思想既以文化提高了，而语言之原形犹在，语言又是和思想分不开的，于是乎繁丰的抽象思想，遂为若干特殊语言的形质作玄学的解释了。以前有人以为亚利安人是开辟印度文明的，希腊人是开辟地中海北岸文明的，这是大错而特错。亚利安人走到印度时，他的文化比土著低，他吸收了土著的文明，后来更增高若干级。希腊人在欧洲东南也是这样，即地中海沿岸赛米提各族人留居地也比希腊文明古得多多。野蛮人一旦进于文化，思想扩张了，而语言犹昔，于是乎凭藉他们语言的特别形质而出之思想，当做妙道玄理了。今试读汉语翻译之佛典，自求会悟，有些语句简直莫明其妙，然而一旦做些梵文的功夫，可以化艰深为平易，化牵强为自然，岂不是那样的思想很受那样的语言支配吗？希腊语言之

支配哲学，前人已多论列，现在姑举一例。亚里斯多德所谓十个范畴者，后人对之有无穷的疏论，然这都是希腊语法上的问题，希腊语正供给我们这么些观念，离希腊语而谈范畴，则范畴断不能是这样子了。今姑置古代的例子，但论近代。德意志民族中出来最有声闻的哲人是康德，此君最有声闻的书是《纯粹评论》，这部书所谈不是一往弥深的德国话吗？这部书有法子翻译吗？英文中译本有二：一出马克斯缪勒手，他是大语言学家，一出麦克尔江，那是很信实的翻译。然而他们的翻译都有时而穷，遇到好些名词须以不译了之，而专治康德学者还要谆谆劝人翻译不可用，只有原文才信实，异国杂学的注释不可取，只有若干本国语言中之标准义疏始可信。哲学应是逻辑的思想，逻辑的思想应是不局促于某一种语言的，应是和算学一样的容易翻译，或者说，不待翻译。然而适得其反，完全不能翻译，则这些哲学受他们所由产生之语言之支配，又有甚么疑惑呢？即如 Ding an sich 一词汉语固不能译他，即英文译了亦不像，然在德文中则 an sich 本是常语，故此名词初不奇怪。又如最通常的动词，如 sein，及 werden，这一类的希腊字，曾经在哲学上作了多少祟，习玄论者所共见。又如戴卡氏之妙语 Cogito ergo sum，翻成

英语已不像话，翻成汉语更做不到。算学思想，则虽以中华与欧洲语言之大异而能涣然转译，哲学思想，则虽以英德语言之不过方言差别，而不能翻译，则哲学之为语言的副产物，似乎不待繁证即可明白了。印度日耳曼语之特别形质，例如主受之分，因致之别，过去及未来，已充及不满，质之与量，体之与抽，以及各种把动词变作名词的方式，不特略习梵文或希腊文方知道，便是略习德语也就感觉到这些麻烦。这些麻烦，便是看来仿佛很严重的哲学分析所自出。

此虽余多年前所持论，今日思之差可自信。思想不能离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一思想之来源与演变，固受甚多人文事件之影响，亦甚受语法之影响。思想愈抽象者，此情形愈明显。性命之谈，古代之抽象思想也。吾故以此一题为此方法之试验焉。

语学的观点之外，又有历史的观点，两者同其重要。用语学的观点所以识“性”“命”诸字之原，用历史的观点所以疏性论历来之变。思想非静止之物，静止则无思想已耳。故虽后学之仪范典型，弟子之承奉师说，其无微变者鲜矣，况公然标异者乎？前如程、朱，后如戴、阮，皆以古儒家义为一固定不移之物，不知分解其变动，乃昌言曰“求其是”，庸詎知所谓是者，相对之词非绝对之词，一时之准非永久之准乎？在此事上，朱子犹胜于戴、阮，朱子论性颇能寻其演变，戴氏则但有一是非矣

(朱子著书中,不足征其历史的观点,然据《语类》所记,知其差能用历史方法。清代朴学家中惠栋、钱大昕诸氏较有历史观点,而钱氏尤长于此。若戴氏一派,最不知别时代之差,“求其是”三字误彼等不少。盖“求其古”尚可借以探流变,“求其是”则师心自用者多矣)。故戴氏所标榜者孟子字义也,而不知彼之陈义绝与孟子远也。所尊者许、郑也,而不察许、郑之性论,上与孔、孟无涉,下反与宋儒有缘也。戴氏、阮氏不能就历史的观点疏说《论语》、《孟子》,斯不辨二子性说之绝异,不能为程、朱二层性说推其渊源,斯不知程、朱在儒家思想史上之地位。阮氏以威仪为明德之正,戴氏以训诂为义理之全,何其陋也!今以演化论之观点疏理自《论语》至于《荀子》古儒家之性说,则儒、墨之争,孟、荀之差,见其所以然矣。布列汉儒之说,以时有序,则程、朱性论非无因而至于前矣。夫思想家陈义多方,若丝之纷,然如明证其环境,罗列其因革,则有条不紊者见矣。

以上语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两义,作者据之以成书者也。第一卷曰字篇,统计先秦文籍中之“性”“命”字,以求其正诂者也。第二卷曰义篇,综论先秦儒家及其相关连者论性命之义,以见其演变者也。第三卷曰绪篇,取汉以来儒家性说之要点分析之,以征宋儒性说之地位,即所以答戴、阮诸氏论程朱之不公也。

(方东树《汉学商兑》一书,于戴氏多所驳议,然彼亦是主张门户者,故与本书第三卷所论者非一事,余不能引为同调也。)